

[美] 瓦莱丽·威尔逊 著 王秀英 译

Valerie Plame Wilson

公平游戏

一名中情局顶尖女特工是如何被白宫出卖的

MY LIFE AS A SPY, MY BETRAYAL BY THE WHITE HOUSE



FAIR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美] 瓦莱丽·威尔逊 著 王秀英 译

Valerie Plame Wilson

公平游戏

一名中情局顶尖女特工是如何被白宫出卖的

FAIR GAME

MY LIFE AS A SPY, MY BETRAYAL BY THE WHITE HOUSE



FAIR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公平游戏

Fair Game: My Life As a Spy, My Betrayal by the White House

By Valerie Plame Wils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LAW PRESS · CHINA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Valerie Plame Wilso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 - 2009 - 7008

目 录

1. 加入中央情报局	1
2. 海外之旅	17
3. 返回总部	28
4. 反核扩散部	32
5. 初为人母	40
6. 双重身份——母亲和间谍	50
7. 乔的尼日尔之行	60
8. 震惊世界的战争	67
9. 身份暴露	82
10. 华盛顿唯一不涉及性的丑闻	99
11. 走出地狱之年	113
12. 抗争掌权者	130
13. 指控	148
14. 离开情报局的日子	163
15. 爱丽丝奇遇	181
16. 利比审判案和告别华盛顿	193
后记	211
尾声	265

1.

加入中央情报局

我们五人一组 —— 三男二女 —— 长途跋涉穿过一片渺无人迹的地区。这里树木繁茂，遍布沼泽。中央情报局将这个地方称为“农场”。当时是凌晨四点钟，我们已经走了一整夜，演练了如何逃脱和躲避敌对方 —— 这些人都是教官扮演的，马上就要与其他同学会合。我们将一起向“敌人”发起攻击，然后登上一架直升机前往安全地带。这次被称为“最后的反攻”的演练活动是我们准军事训练的高潮。每个人都要携带 80 磅重的背包，里面装满了必需的生存物品：帐篷，冻干食品，用于净化饮用水的药片，还有 M-16 步枪所用的 5.56 毫米的子弹。深秋的天气寒气逼人，大家的军靴上都溅满了泥浆，脚后跟磨出的一个水泡让我感到针扎一样的刺痛。我的朋友皮特曾经是一位军官，他平日妙语连珠，笑容满面，这时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了。约翰，我们当中的啤酒大王，不仅背上驮着背包，还要负担至少超过自身体重 50 磅的重物，他圆圆的脸上已尽是泥土和汗水。

前方的人用手势发出信号，真是谢天谢地！大家停了下来，摇着肩膀卸下背包，一起倚靠在一个用于防御的小山包下休息了片刻，接着重整队伍，向登机点进发。我们终于在破晓时分到达一块空旷地。这时，我几乎辨认不出那架螺旋桨叶正在缓慢旋转的巨型直升机，还有我的其他朋友

莎伦、戴维和特克斯的友善的面庞。我听到皮特低声说道：“终于到了。”顿时，大家全都向直升机蜂拥过去，一种既解脱又期盼的感觉给我们浑身增添了力量。我开始憧憬在这次训练结束后去洗个痛快的热水澡。突然，我们头顶上方出现一团团镁弹燃烧时发出的炫目的火光，并伴随着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一阵接一阵的机枪声让我的肾上腺素升高，血流加快。

我扑倒在地上，朝着皮特的方向爬去，心想他会知道该做什么。尽管已经有了三个月艰苦训练的经历，但在市郊那种宁静而又悠闲的环境下长大的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和随之而来的身体上的强烈感觉却是手足无措。皮特拖着我走出几码远，来到一个高处，他指着直升机对我说：“笨蛋，快上去吧！”

在我明白过来之前，大家哪还顾得上装出服从军纪的样子，拼命跑向直升机。当我们全力奔跑，跌跌撞撞冲下山去时，M-16 步枪在不停地射击。这时，我瞥见一个同学在我身旁跑，他脸上的表情让人看出他感到一丝乐趣，或许至少他已感觉到这个场面的滑稽可笑。没过多久，我从直升机敞开的机门跌了进去，坐在里面，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下面的枪声不断，耳畔响着震耳欲聋的螺旋桨叶的旋转声和发动机的引擎声。过了一会儿，我才把背包从肩上卸下来。当我们被带到安全地带时，我对自己在“农场”的表现惊诧不已。

当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时，我读过威廉·史蒂文森的书《一个勇敢的男人》。这是一本描写主人公“二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工作的书。OSS 是中央情报局（CIA，下文也称情报局）的前身。我很喜欢这本书，并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考虑一些问题：为 CIA 工作将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加入其中，会对我有什么要求？这种工作危险吗？我相信 CIA 所做的事吗？我们全家人一直很看重公共事业部门的工作，而且心中始终怀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感。在纪念阵亡将士节和国庆节之日，我们总会在一个大花坛上插上一面国旗。我父亲塞缪尔·普莱姆是一位退休的空军上校。1941 年 12 月，当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正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读书。他记得第二天整个校园死一般寂静，所有的适龄男生都签约服兵役去了。我父亲也很快应征入伍，踏上征程。他所服役的空军军团是美国空军的前身，驻扎在圣地亚

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南太平洋任职。那段时间里,他过得很快活,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笑话,还有歌声。我的哥哥罗伯特·普莱姆比我大十六岁,他 1966 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很快被派往越南。1967 年的一天,当我和父母购物归来时,听邻居说有两个穿海军军装的人敲过我家的门。我们得知鲍勃(罗伯特的昵称)是军事失踪人员。我年迈的父母当时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不知道鲍勃是死是活。原来他在一次执行敌后侦察任务时右臂受了很重的伤,最后被安置在一艘作为医用的船上。以后的几年里,他经历了多次痛苦的手术以恢复肢体的功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用一只可以活动的手臂和手,他继续学习飞行、滑雪、写作,甚至系鞋带。他的妻子克里斯蒂是一名护士。他们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拥有两个令人骄傲的聪明、漂亮的女儿,婚姻幸福美满。当时我想,如果我去 CIA 工作,这将延续我们家族为国家服务的传统。然而,仍旧有一些疑虑缠绕在我的心头。CIA 的人是否曾企图用看上去像雪茄的爆炸装置杀害卡斯特罗?

“想象你正在一家国外酒店里与一名情报员接头。突然,外面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同时听到有人在喊‘警察,快开门!’这时你会怎样做?”问我问题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看上去有些年长的女士。她戴着珠宝首饰,身着一件很鲜亮的明黄色罩衫。这是我在 CIA 的第一次面试。在此之前,我入住了一家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简朴——应该说是简陋的旅店。除了第二天会在华盛顿郊外的一栋米色大楼里进行的面试以及一连串传统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你的强项和弱项”、“你为什么要为 CIA 工作”,我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一直到面试开始。但这次的问题却偏离了那种老的套路,让人感到更有兴趣。我马上想到的不是特工活动,一对素不相识的孤男寡女一起在酒店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我会脱掉衣服,并告诉那位情报员也照此去做,然后在警察进来之前到床上去。”从那位女士脸上露出的明显笑容可以看出我答对了这道题。我心里在想,这工作挺好玩儿。我已准备好回答下一个问题。

后来我也想过,如果不能被 CIA 录用,我会去国会山或和平队*谋职。在 CIA 求职期间,我曾经在华盛顿的一家百货大楼找到过一份做管理培训师的工作。除了可以享受百分之二十的员工购物折扣的待遇之外,我丝毫不喜欢在零售业工作,但这是我在那几个月时间里的权宜之计。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要继续接受 CIA 的心理测试和多次的面试,还有严格的身体方面的综合考核。为此,我需要赚钱以支付我的房租费用。有一个问题至今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一次至少有四百道题的心理测试中的一道:“你喜欢高个子女人吗?”我现在仍无从知晓我当时的回答是否正确。那年夏末,我被叫去接受测谎仪测试。这是一段离奇古怪但却相对简短的经历。与此同时,情报局在安全背景方面对我进行了调查。好几个邻居都告诉我父母,有人向他们问过我是否酗酒、吸毒或是否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在坐落于人口稠密的弗吉尼亚郊外的一座朴实无华的办公楼中的一间教室里,我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很难描述那间教室的样子。当时,我们正在上 CIA 入门课。我留心观察我的同学们。很显然,大多数年轻的男士是退役军人,一些人仍是普通的运动型装束。女士的人数不到一半。后来我得知,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会像我一样到行动司(DO)工作,其他人会被安排到情报司(DI)做分析师或者到管理司(DA)做管理/后勤官员。有几位原来是工程师,最终被安排在科技司(DST)——情报局的研究分支。在一次课间小憩时,一位身材矮小、体态敦实的女士将我和三位男同学叫到她的办公室。她是行动司和职业培训部(CTs)之间的联络员,换句话说,她是我们培训阶段的总管。很难相信,这位貌似家庭主妇的女士已经是这个行业中的老手了。对中情局,她当然知道得要比我们多得多。PCS 的意思是“情报站的长期改变”(Permanent Change of Station),换句话说,就是被派往国外。当我们环顾周围,满眼都是这些首字母的缩略语时,心中清楚地感受到 CIA 准军事化的文化氛围。

午餐休息时,在餐桌旁或旁边的咖啡厅里,我结识了同班同学。他们

* 和平队是美国 1961 年 3 月 31 日根据时任总统肯尼迪签署的命令成立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受美国国务院资助,其活动受美国总统办公公司的直接管辖。——译者注

让我心中油然而产生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大多数人或就读过声名显赫的名牌大学,或至少获得了硕士学位,还有一些人有过数年的军旅生涯。所有人看上去都比我沉着老练,见多识广,精明能干,我只有甘拜下风了。我发誓一定要少说多做,尽可能多地向别人学习。或许,当时无人注意到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而且只在州立学校读过书。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交往得很有兴致,也很愉快。在面试中,每个人都要参加迈尔斯布里格斯心理侧面测试(Myers Briggs psychological profile test)。在我们这些未来的特工中,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所取得的 ENTJ 分数参差不齐。ENTJ 是指外向性格(Extrovert)、直觉(Intuitive)、推理能力(Thinking)和判断力(Judgement)。具有 ENTJ 个性的典型表现是行为果敢,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据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所说,“ENTJ 型的人会对既定的做事程序保持宽容态度,但如果这种程序将其所要完成的目标置之度外时,他们会放弃这样的程序……他们孜孜不息地致力于工作,为了工作,他们可以放弃生活的其他领域。ENTJ 型的女性在择偶方面会遇到困难,因为她们一定要选择一位被她们的个性和意愿所征服的人。”ENTJ 型的人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显然,这就是为什么 CIA 要选择这些人作为未来特工的原因。我和我的同学们惺惺相惜,相处得十分融洽,不仅因为我们会受到相同的训练,最终会从事同样的工作,也因为我们有着十分相近的个性。不论什么时候,每当这些未来的实战特工们休息时聚在一起,我们都是讲话声音最高、最善交际,同时也是我认为最乐观、开朗的一群人。在我们聚集的地方,空气中都好像洋溢着欢乐。我开始在班里结交朋友,不再对我们过去的不同背景有所顾虑,大家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每天,我都盼着去上 CIA 入门课。在课上,我们了解到情报局是如何组建的;情报是如何被收集和分析的;更大的情报组织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最引人入胜的客座演讲者是一位女士。她的第一次任务是在莫斯科做实战特工,她向我们讲述了那些令人发怵的特工活动细节。她是在整理和送出那些“死投”(dead drops)时被苏联情报人员监视到的。那些“死投”是一些伪装了的石头或其他表面毫无破绽的容器,里面装的是送给一位重要的苏联双面情报员的纸条、钱和一些说明。最后,她被驱逐出境(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或在 CIA 行话里叫做 PNGed)。但是那位

情报员,也就是她负责的那位间谍却没有那么幸运,他被处死了。听了这些,我们都感到极大的震惊,坐在那里,良久无语,深深感到作为 CIA 成员的重大责任以及如果出错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最后,结束了大约三个月的“CIA 101”(“CIA 101”是我们出于喜爱给这个课程起的名字)之后,我们都被派往进行各种各样的“过渡”,也就是上岗培训。作为一个受训者,在情报局的这段过渡时期与宣誓加入女大学生联谊会有得一比。我们被分派的任务是最枯燥乏味的,要花很多时间向远方的总部大楼发送电报和备忘录,或者在一间很大的被称为档案室的地下室里等待一宗档案材料的到来。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过渡阶段的开始。

女性实战特工有两类人:一类人是以前的秘书,她们一直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地工作,最后终于离开了秘书的办公桌来到实战特工这块阵地上。另一类人是实战特工的太太们,她们过去抚育子女,深居简出,而他们的丈夫作为特工,在外面的生活丰富多彩。她们出于对家庭生活的厌倦而改变自己,选择另外一种方式的生活。除了这两类人,鲜有例外。有一些年长的女士,她们坚忍、执著,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在过渡阶段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时常去看望她们,由衷地敬佩她们超凡的志向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她们大多数人早出晚归,很显然,为了这份工作,她们付出了代价,牺牲了个人幸福。我所在的班上有五十五名学员,只有不到一半是女士,其中只有四位被指派去执行任务。或者是因为年轻幼稚,我那时没有被列在新的 CIA 先头队伍里。我只想做好工作,并不希望因为性别而受到歧视。

在过渡阶段的大部分时间中,我被安排在行动司的欧洲部。尽管工作简单乏味,总的来说,我还是乐在其中。诚然,我也在焦急地屈指计算要等多少天才能到“农场”接受准军事训练。终于,这一天到来了。我收拾行囊,和一位年轻的受训者一起驱车向南进发。我的过渡阶段比大多数同班同学都要长,训练的内容也更多,后来还加入了另外一个训练班。很早的时候,我就接受了情报局的指示,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我离开华盛顿的这段时间是为了接受某种难以说清楚的“训练”。我在情报局以外的朋友们当时都很忙碌,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而培训则是每

个人早期工作的一部分。这样,也就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了,至少没有人直接怀疑我。当时,只有我的父母和哥哥知道我工作的真正地方。我和母亲一致认为不要告诉我的舅舅——她的兄弟,他是空军中最早一批驾驶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之一。他会为我的职业选择感到非常骄傲,以至于不能保守住秘密。当我开车沿着高速公路向“农场”方向疾驶时,我心中热切地盼望着下一个训练的开始,这将使我和实战特工的实战任务更加靠近。

“看清尺码,每人一件,继续往前,走!”身穿迷彩服的教官在喊着。这时,我们正慌乱地挤在一间有很多孔眼,好像那种有波纹的罐头盒一样的仓库里。这间仓库位于“农场”的一片旷地上,里面的光线很昏暗。我们从一些巨大的箱子里挑选着军靴、迷彩服、绳索、军帽、水壶、背包和其他随身物品。这些都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训练中所需要的物品。当我们抱着这些几乎抱不动的装备走出来时,那些教官们——全部都是退役军人类型,把我们带到了坐落在脏乱不堪的松树林深处的一些半圆形的活动房屋里。这些房屋将是我们的寝室,两边是女士房间,里面有上下铺,房间的一头有一间浴室。在我上中学时,我从未有过必须要穿校服的时候。当我换上迷彩服,想到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天费心挑选要穿的全套衣服——哪些鞋子要搭配哪些鞋带时,心中还是挺欢喜的。

我们的训练很快就有了固定的模式,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开始身体训练,包括跑步或队形操练。列队行走时,大家一起唱一些粗俗的歌曲以保持步伐整齐,就像几十年来部队的新兵所做的那样。接着,抓紧时间吃早餐,然后去上上午的军纪课。午餐的食物是用类似传统的南部烹饪方法制作的食品。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裹上面糊用油炸,只有沙拉有时有些新花样。午餐之后通常有一些户外活动。到了晚餐时,仍旧是油炸食品,而且炸得颜色更深。只有晚上九点钟熄灯之前有很短暂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样自然会有很多抱怨,在学员中,脾气好的人有,刁钻刻薄的人也在。但教官们的能力对付那一小撮刁民还是绰绰有余的,所有的人

都被管制得服服帖帖。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课程对身体上的要求还是很苛刻的。早晨至少要跑三英里,同时要背负 80 磅重的背包和一支 M-16 步枪,跋涉穿过树林。不止一个负重超重的学员在行军途中掉队,或者在匍匐前进过程中退下来。幸亏我以前一直是一名业余运动员,虽然课程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我还是完全可以应对的。我开始感到“农场”的生活真好像军营一样。

每个星期的训练项目都是不一样的。教官们费尽全力使班上的学员保持步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还要严明军纪。情报局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很少会有机会使用这些技能,但是对新学员来说,“农场”的准军事课程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从管理的角度看,学习这些技能是为了培养一种团结协作的精神,不管我们今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它都会使我们终身受益。

第一期课程中有一门课是了解武器的性能和如何使用武器。和我的那些退役军人同学相比,我和枪支打交道的时间实在有限。我父亲曾经把他在“二战”期间使用过的手枪挂在床脚。有一次,我在家中遇到了一个私闯民宅的人。尽管我从未学习过使用手枪,但那一次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因为我发现我竟然能够很娴熟地使用它。或许是因为新手的运气,我很容易就掌握了那些要领:屏住呼吸,仔细瞄准,轻扣扳机。显然,我是班上最棒的,我的很多男同学在这方面和我相比都自叹不如。我的手枪考试得到了很高的分数,这是我最骄傲的时刻。况且我当时是靠拄双拐保持平衡的,因为我在一次早晨跑步时扭伤了踝骨。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所学的技能与其说适合于一个潜伏在酒吧里的 CIA 特工,不如说更适合于一个军事别动队员。我们一直隐约感到,总有一天要接受如何面对审讯的训练,以提高被俘之后在这方面的应对能力。从一开始,我们就学习如何把自己伪装起来,并使这种伪装不露破绽。我们知道在课程结束时会有严格的测试,但却无从知道这种测试会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进行。星期一的拂晓时分,当时所有的学员都已周末休假回来。我们被一阵阵叫喊声,同时还夹杂着漫骂声惊醒。当我们从床上爬起来时,感到探照灯的灯光在脸上扫来扫去。

虽然心里清楚我们课程中的最具有挑战性的时刻正在到来,但当我

们环顾四周,看不到教官们那熟悉的面庞时,大家还是有些惊慌失措。来了一些陌生的军官,他们穿着迷彩服,脸上带着黑色的有洞面罩。我在匆忙中穿衣服时不断地对自己说这是一次演习,但是当我们从住所向外面的树林走时,那些粗鲁的谩骂和用力的推搡还是使我感到异常紧张。一连几个小时,我们被迫在黑暗中时而匍匐前进,时而疾走急停。如果有人行动怠慢,就要被踢或挨骂。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穿越树林的行军,大家都已筋疲力尽,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了,每一个人的手都搭在前面人的肩上。后来我们全部被赶上了一辆等在那里的军车。汽车载着我们驶过满是灰尘的公路,最后停在了一栋被松树环绕、由白色水泥砌成的小楼前。真正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当时我已经蒙头转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感觉交织在一起,给我的心理造成很大冲击。大脑中,一个理智的声音不断地在说:“这只是一次演习。”而另一个声音也在小声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肯定是真的。”

几个小时之后,开始面对第一次审讯,我极力使自己保持机警。当我坐下来时——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享受这种待遇了——我才敢环视四周。令我高兴的是,一个已经成为我的朋友的同学这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坐在那里。他的脸上闪现着微笑,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这时,我又找回了自信,我想,我会顺利过关的。

我晕倒了——由于低血糖——落在后面。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倒在那位年长的“农场”主任的怀里,这使我很窘迫。这个人曾在我们来的第一天给我们训话,我在远处见过他。好消息还是有的,至少我知道这是一次演习。心理上的轻松是短暂的。我喜欢这间新的小木屋家里的寂静和黑暗,心里开始盘算那年圣诞节时要给哪些亲朋好友寄去贺卡,以及还能记起多少详细的地址。最后,我们终于被平日的教官“释放”了。我们坐在军用卡车的后面,又经过一段崎岖颠簸的路,才回到了住所。这时,大家已是满身污渍,头晕脑涨,饥肠辘辘了。当我在淋浴器下面洗着热水澡时,感觉这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那次被俘演习很快就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了。我已经通过了情报局的又一次考试,没有在班上掉队。周末,我好好地睡了一觉,然后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

“一,二,三,跳!”我的耳边是教官的叫喊声和呼呼的风声,双腿悬在敞开的机舱门外,体会到平生从未有过的恐惧。但是教官已经宣布,如果乘飞机上去的话,唯一的着陆方法就是跳伞。他检查了我们的降落伞并系好绳索。认定已没有退路,我只能将身子向前倾斜——背后受到瑞德教官的一把猛推,接着就以每小时 120 英里的速度向地面俯冲下去。正如那些教官们事先讲的那样,第一次跳伞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是地面训练中必不可少的项目。一开始是从齐肩高的平台上往下跳,然后是从高塔上往下跳,直接跳到绑在长长的缆绳一头的铺有垫子的军用卡车上。当降落伞在我头顶上方打开时,我开始慢慢地向下飘落。随后,向上伸手抓住套环,掌控好方向,注意远离那些飞快靠近我的电线,最后,准确地落在地面上白色粉笔画好的圆圈内。负责跳伞的教官们曾教过我们,着陆时要双脚落地,以缓冲地面对身体所产生的冲击,然后在地上滚动。118 磅的体重是很轻的,因此,我双脚落地时身体很容易保持直立。尽管这样,我下落时的动作和在地面滚动的姿势还是未能免于教官的指责。能够落在画好的粉笔圈内,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随之心中产生一种英雄主义的自豪感。“我做到了!”再跳四次,我就可以得到那枚向往已久的“跳伞飞行章”。这个念头令我精神振奋,信心倍增,我已稳操胜券,获得它,舍我其谁。

准军事课程结束时,我们可以选择去跳伞学校——只要我们能通过身体测试和标准要求。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去尝试。经过大约十个星期的身体状态调整,我们感到可以在早餐时吃下蜗牛了。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跳伞的,有些人尽管尽了很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未能过关。一位叫凯琳的女士是我此次不可小视之人,她极为争强好胜,肯定会去跳伞。这个人本质上并不是一位“复仇女神”,但她那盛气凌人的架势让我渐渐产生了一种与其一拼高低的竞争冲动。我出色地通过了考试,只是因为我不想输给她。又经过几天的训练,我们被告知要在三天之内做五次跳伞才能获得飞行章。我实在没有勇气把我最近的“工作机会”告诉我的父母——我母亲会整整一个星期都难以入

眠的。

第一次跳伞是在一天的拂晓,天空刚刚开始发白,凉风习习,十分惬意。我们一组六人经过安全检查,然后一次两人登上轻型飞机。和我们一行的还有瑞德,那个嘴上总是叼着烟斗的跳伞教官。当发现我的超级竞争对手凯琳也和我坐在同一机舱里时,我的心中掠过一丝不快。当我看到她第一个匆匆站起身来,接着瑞德教官在其身后推了一把时,我就想,如果她能做到,我也能。几分钟后,我也跳了下去。

所有的人都跳了下去——从开始时天空上的小黑点到最后系着尼龙绳落到地上的人——我们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感到淋漓痛快,士气大增。后来,瑞德带着一脸的威严从机库走出来。他刚刚听到消息,后面的几天会有暴风雨。因此,他想知道我们是否愿意在那天下午把五次跳伞全部完成。我们面面相觑——别无选择。大家默默无言地收拾好降落伞,然后快速跑到机库为后面的跳伞做准备。在迷彩服别上那枚小小的银质的“跳伞飞行章”之前,我们不打算离开“农场”。

早上七点半的时候,我轻轻叩门,然后把房门推开一条缝。当听到一声“进来”时,我迈进了那间办公室。我的特工课程顾问迪克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抽着一支香烟,浓重的烟草味充满了那间屋子的狭小空间。他的外表给人印象是,留着短平头,上身穿一件短袖方格布衬衣,戴着一副厚厚镜片的眼镜,习惯在烟灰缸旁放一听可乐——这是他早餐最喜欢喝的饮料。“怎么样?”他瓮声瓮气地问我,一边将手移到嘴边,猛地吸了一口烟。迪克不是一个很差的顾问,但他的作用也不是很明显。

多年的海外生活,与各种情报员打交道,还要把握好难度很高的双重身份,这些活动使特工们的健康、婚姻和家庭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情报局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将那些“有问题”的特工送到“农场”,让他们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这样或许能够使他们修复创伤,恢复往日的常态。但结果却是很多“受伤了”的特工传递给我们这些充满理想的新学员这样一个信息:在 CIA 工作是服苦役。高级管理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公布一些“农场”的“明星”,并以晋级作为奖励,目的是给那些年轻的

特工们树立榜样。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最优秀、工作最有成效的特工最想从事的工作是招募间谍。

然而,迪克还是有相当多的实战经验的。当我向他请教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演练时,他从我的肩膀上方喷出烟雾,然后低下头,透过厚厚的镜片审阅我在头一天深夜里写成的最新报告。虽然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优游一番并非难事,但是如果确实想在这个领域里谋职,完成现在的课程要求则需要一个人穷其所能了。通过规定短暂期限、剥夺睡眠、不断的震惊和所有可以想到的变化,教官们向接受培训的学员们逐渐施加压力。我感到就像生活在显微镜下,所有的身心活动,甚至难得的放松时刻,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从撰写报告到特工演练之后回答教官关于执行任务的询问,再到晚上和教官一起喝啤酒。我们知道自己正在接受评估:我们是 CIA 的合适人选吗?

几个星期前开始的特工课程开场训练出乎意料的容易。我们要做的是找到我们的目标,然后去诱惑他/她,再确定下一次约会。当我在人群熙攘的房间里寻找我的“猎物”时,我发现我的有些相关的生活经历或许可以派上用场。过去,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加入 Pi Beta Phi 女生联谊会时,一开始有过东碰西撞,近乎抓狂的几个星期。适应之后,我参加过许多各路云集的聚会。在这样的聚会中,只要能融入进去,然后轻松自如地运用一些开玩笑和打诨逗趣儿的技巧,就会在社交圈里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好,开始吧!我在心里笑了一下,把这间房子想象成一次联谊会的地点。现在,我身在其中,正在寻找我要找的目标,一个叫“格瑞”的人。自我介绍后,交谈一会儿,然后进入主题,这一切对我来说很容易。显然,我在取得谈话进展方面还是驾轻就熟的。当我在聚会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时,我有一个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谈论自己。其实,回答别人对你的询问,特别是当你不愿意太多地展示自己时,先简要回答以示礼貌,然后再把问题转向你的谈话对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课程使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益匪浅。因为这种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设法转移到对方身上的能力在我的工作中是至关重要的。

在找到格瑞之前,我暂时把目光从四周收了回来,径直向吧台快速走去。我把我装着葡萄酒的酒杯递了回去,加了一些汽水,这样看起来就像